

走向革命:以容闳为中心

雷 颐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关键词】 容闳;留学生;改良;革命

【摘 要】 近代中国留学事业的开拓者容闳从参与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到最后支持革命,从温和的改革者到激烈的革命者的曲折过程,不仅反映了一代留学生的心路历程,更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变化。因此,他从“温和改良”到“走向革命”的一生,就像镜子一样映照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而且,他的个案又说明“革命”的发生往往是统治阶级不愿改革的政策所导致的。

【中图分类号】 K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6425(2012)05-0001-11

近代中国留学事业的开拓者容闳从参与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到最后支持革命,从温和的改革者到激烈的革命者的曲折过程,不仅反映了一代留学生的心路历程,更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心态变化。进一步说,在风起云涌的中国近代史上,容闳确非风云人物,但却是唯一的“全程”参与者,因此,他的一生像镜子一样映照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

一、启蒙先驱

1828年(清道光八年)深秋,容闳(原名光照,号纯甫)出生在广东香山县一户贫困农家。此时,原属香山县的小岛澳门已被葡萄牙殖民者占租近三百年。中国历有边患,对一个远离中原、荒芜不堪的弹丸小岛被“红毛夷”占租,长期以来,粤人并不以为意。然而,自15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全球化的进程已经开始,澳门的被租占其实是“全球化”序曲中的小小一节。这种背景,与传统边患完全不同,其意义迟早将在历史的进程中表现出来。因此,在华夏文化版图中长期处于“边陲”的岭南地区,必将一跃而得全球化的“风气之先”,成为引领近代中国的先进之区。当时尚处偏僻之地的贫穷农家之子容闳,因缘际会,成为历史新潮中“向涛头立”的弄潮儿。

明中期后,西方的自然科学已经超过中国,来华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将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

介绍到中国,作为传教策略。因与教会的矛盾冲突,从康熙朝后期直到鸦片战争前,清朝一直实行禁教政策。但是,西方传教士一直没有停止悄悄在中国沿海传教的活动,并为贫穷人家兴办一些医院和学校,以吸引人入教。葡占澳门,自然成为传教的大本营。

容闳7岁时,其父把他送到澳门一所教会学校上学。几年的教会学校教育,使他对西方历史、地理、文化有了初步的了解。如果说林则徐、魏源是近代中国“精英”开始“睁眼看世界”的代表,那么容闳等几个乡间穷小子,则是“草根”开始“睁眼看世界”的代表。林、魏的“看世界”是“自觉的”,而容闳的“看世界”则是“自然的”。

1846年底,容闳决心随勃朗校长夫妇返美,1847年1月4日,容闳与其他两位同学一起跟随勃朗校长从广州黄埔港乘船赴美,于4月12日到达纽约。然后前往马萨诸塞州,入孟松学校。在孟松学校校长哈蒙德的教诲、影响下,容闳阅读了大量文学著作。在18世纪早中期的英国,一些著名学者如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思想家边沁、哲学家哈奇森和休谟、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文学家司各特、社会学的鼻祖弗格森等人,活跃在苏格兰地区,以爱丁堡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思想派别,被称为“苏格兰启蒙学派”。苏格兰启蒙学派具有强烈的经验主义和反唯理论特点,重视个人知识在形成人类秩序中的作用,注重常识,强调社会演

【收稿日期】 2012-04-28

【作者简介】 雷颐,男,湖南长沙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化的重要性,主张经济放任主义。容闳爱读的《爱丁堡评论》杂志,则是苏格兰启蒙学派的重要阵地。他们还从新知识和启蒙思想的角度抨击过牛津和剑桥大学教育的腐朽衰败,表达了他们对大学教育的失望。后来,从容闳对中国传统教育的批判和改造以及对中国社会改革的观点中,也可看到这份杂志的影响和苏格兰启蒙学派潜移默化的间接影响。

容闳无疑是最早接触、接受近代启蒙思想的中国人。虽然他的了解、接受是零星的、破碎的、间接的、感性的,并因过于“超前”而影响不大,但其象征意义却不容低估,预示着近代启蒙思潮即将激荡古老的中华帝国。君不见,“启蒙”在近代中国虽然屡遭挫顿,甚至“夭折”,但又屡屡重生。而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苏格兰启蒙运动”终于开始引起国内思想界、学术界的重视。时距容闳接触苏格兰启蒙运动,已整整一个半世纪过去。作为具体的个人,容闳的经历纯属偶然;但作为“符号”出现的“容闳”,却是全球化中国进程中的必然。

从孟松学校毕业后,容闳于1848年考入耶鲁大学。虽然他在美国的大学生活如鱼得水,但他仍时时想起祖国,他说“予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适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不乐,转愿不受此良教育之为愈。”“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1]他亲眼看到了西方的富强,更感到中国的落后,但更使他忧心不已的是当时中国人对外部世界仍然茫无所知,仍认为中国是天下中心。所以,他在大学快毕业时就下决心“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予后来之事业,盖以此为标准,专心致志以为之。”^[2]事实证明,从他1854年回国后到1872年办成留学之事,历经18年,他一直为此目标努力奋斗,忠贞不渝。1854年,容闳以优异的成绩从耶鲁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于这年秋天自纽约乘船踏上归程,决心将自己学到的新知识奉献给离别了8年的祖国。

二、从到访“天国”到涉足洋务

容闳先后在广州、香港工作,后来到上海。在上海,他的社交面逐渐扩大,与《几何原本》的翻译者著名数学家李善兰、较早翻译西方数学和物理学著作的华蘅芳、化学家徐寿等名流成为朋友。

这些人是中国当时绝无仅有的几个了解西方近代科学的人物,不久曾国藩办洋务时都入曾国藩幕。

不过,容闳的目光最先却是投向太平天国,把改造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太平天国身上。他之所以首先对太平天国寄以希望,一是洪秀全族兄洪仁玕1859年自香港到达天京,受到洪秀全重用,被封为干王。容闳在香港时就与洪仁玕相识,知道他思想开明,因此认为他有可能支持自己改造中国的构想。二是容闳痛恨清政府的残暴、腐败,对太平军抱有好感。所以他在1860年与两位外国传教士一起冒险前往“天京”考察,他承认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弄清楚太平军的性质,察看他们是否适合建立一个新政府,以取代清王朝^[3]。

容闳见到干王后立即和盘托出自己的建国之策。这些建议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等重要方面,是他改革旧制度、建立近代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理想蓝图。虽然当时看来像是天方夜谭,但其实反映了历史的趋势。两天后,洪仁玕又主动和他见面,肯定了容闳所提出建议的优点和重要性,但最后却说,这些建议的意义只有他一人理解,得不到其他人的支持,所以无法实施。这番话其实婉转告诉容闳,现在根本无法实行这些设想,因此容闳大失所望。

虽然洪仁玕任命他为高官,但容闳经过一个多月的观察,深感太平天国不能实现他的理想。他根据对太平军领袖行为和品行及施行政策的判断,对他们最后能否成功大表怀疑,认为太平天国既不能完成改革中国大业,也无法使中国复兴^[4]。之后,他来到干王府,对干王如此器重自己,授予自己如此显贵的身份深表感谢,但将委任状和官印当面还给洪仁玕,最后,失望地离开了天京。

当他正在苦闷之时,曾国藩的几位幕僚、也是容闳的朋友在短短的三四个月内,分别发五封信邀容闳来安庆入幕,次次紧催。曾国藩礼贤下士的“三请”之举,使容闳大为感动,并且感到实现自己平生抱负的机会可能来临,于是在9月的一天到达安庆。

原来,曾国藩想设立机器厂制造外国最先进的来复枪,召他入幕,主要是要他创办机器造枪厂。对此计划,容闳很是高兴,但并不完全赞同。容闳认为,曾国藩并不了解机器生产情况,中国现在最缺的不是生产具体武器的工厂,而是生产制造武器的机器的工厂,即“制器之器”。容闳向曾国藩等人解说道“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

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例如今有一厂,厂中有各式之车床、锥、镗等物;有此车床、锥、镗,可造出各种根本机器;由此根本机器,即可用以制造枪炮、农具、钟表及其他种种有机机械之物。以中国幅员如是之大,必须有数种各种之机器厂,乃克敷用,而欲立各种之机器厂,必先有一良好之总厂以为母厂,然后乃可发生多数之子厂。既有多数之子厂,乃复并而为一,通力合作。以中国原料之廉,人工之贱,将来自造之机器,必较购之欧美者价廉多矣,是即予个人之鄙见也。”^[8]

曾国藩从善如流,对首先应办“机器母厂”的建议大表赞成,立即要他负责筹办此厂,到美国置办机器。一个星期后,曾国藩给容闳下了委任状,授予五品军功头衔,并请赐带蓝翎,正式任命他为出洋委员。此头衔只在国家用兵时封赠从军有功之人,为文职所无,由此可见,曾国藩对他特别器重。受曾氏之托,容闳于12月初离开上海,前往美国,购买新式机器。

三、艰难开辟留学之路

在美国留学毕业前夕,容闳就认定以派遣留学生为先导建立新式教育体制,是救国强国最重要的途径。回国之后,他一直想方设法,却屡屡碰壁,一筹莫展。得到曾国藩重用后,他感到此事可成,但要等待时机,因为当时国人对新式教育、尤其是出洋留学完全没有概念,若操之过急,很可能欲速则不达。

容闳在美国订制的机器8月顺利运到上海,他也在9月回到上海。这批机器成为江南制造总局里最新式、最重要的母机,是中国工业化起步的重要标志。对容闳的工作,曾国藩大加赞扬,不久即保奏容闳为五品实官,封其为江苏省候补同知,在江苏省衙署任通事译员,官位五品。但容闳念念不忘自己的“留学教育计划”,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曾国藩受命处理此事,急调容闳到天津担任翻译。其间经过努力,他向曾国藩提出的留学计划终于获得首肯。容闳得此喜讯已是深夜,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予闻此消息,乃喜而不寐,竟夜开眼如夜鹰,觉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忘其为偃卧床第间。”^[9] 历尽艰辛、为之奋斗了十几年的理想终于快要实现了,因而十分兴奋;而且

他坚信,如果他的教育计划能够实行,“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10]。

1870年冬,清廷批准派遣留学生,后任命陈兰彬任出洋局委员、容闳为副委员。经过百般努力,好不容易才凑足了首批30名官派赴美留学生,于1872年8月中旬从上海启航赴美,开启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新的一页。

但是,由于其他官员对他和留学生的诬告,几年后,朝廷决定将留美学生全部撤回。得知清政府的态度后,容闳又气又急,四处奔走,想方设法拜访、联络美国社会名流和政要,希望借助他们的力量劝说清政府改变态度,挽回事态。但这些全无用处,1881年6月,总理衙门大臣奕訢上《奏请撤回留美肄业学生折》,援引陈兰彬的话指责留美幼童“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先已沾其恶习”,“路歧丝染,未免见异思迁”,奏折不辨是非,提出将留学生全部撤回。从1881年8月起,留美幼童分三批撤回,将近10年的留美学习,最终功亏一篑^[11]。

留美幼童提前撤回、容闳教育兴国计划中途夭折,是中国近代化的一次严重挫折,不过,其意义却不容低估。因为此留学计划的实施毕竟是中国教育走向近代的艰难一步,是中国教育制度近代化的先声。而且,更是后来越来越强劲的“教育救国”思潮的先导,今日提出的“科教兴国”,亦可溯源至此。“西学东渐”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内容,首批派遣留学生毕竟在当时壁垒森严的“夷夏之大防”中打开了一个缺口,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直接沐浴“欧风美雨”,开创了“西学东渐”的新阶段,开启了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新纪元。

四、参与维新

留美幼童功败垂成,这对容闳的理想和抱负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不过,在心灰意冷之中,他仍时时关心国事。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身在异国他乡的容闳一直坐卧不安,为祖国命运担忧,他把儿子托付给美国朋友照料后便启程回国,由上海赶到南京,拜谒署两江总督张之洞。他向张之洞提出聘请洋人为外交、财政、海军、陆军四部顾问,使中国行政机关依西欧成规,重新组织建设。这些建议说明,容闳认为中国已到进行制度革新的时候了。虽然他的建议不被采纳,但他爱国之心不死,随后来到北京,想寻找机会打动朝廷。从1896年到1898年间,他通过各种渠道

向清政府提出种种兴国方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出设立国家银行、修筑全国铁路两大建议,并有详备可行的章程和实施细则。

此时中国尤其是沿海地区的近代工商业已有长足的进展,但没有国家银行,严重束缚了经济发展,而清政府根本没有认识到近代银行为何物。容闳深知近代银行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早在1860年就曾劝太平天国建立国家银行,后将美国一些银行的组织、规章制度译成中文。1896年3月,他以此为基础,通过有关大臣给光绪帝递上两个创办近代国家银行的条陈。这两个条陈共有大小条文46条,对银行的资金来源、权责、国家资本与商股关系、钞票发行控制、财务清算、总行与分行关系、印发债券,甚至连债券、银票的样式都随有草图详加说明。这是一套完整、系统、详细而且可行的近代银行方案,国人闻所未闻,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专门召见了。他的计划很快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容闳备受鼓舞,立即着手选址购地、招聘挑选合适人员,并受户部委托准备赴美与美国财政部接洽有关事宜。

然而,正在此时,兴办国家银行的方案却被盛宣怀破坏。盛宣怀是经办洋务的重要官员,当然知道办现代银行不仅是大势所趋,且是重大利源,所以一心想自己承办这些事情。他不仅具有商人的头脑,更是老谋深算的官僚,用重金开路,因此朝廷上下人脉极广。而容闳对官场规则一窍不通、与各方官僚很少来往,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当盛宣怀得知朝廷批准容闳创建国家银行的消息后,立即致电翁同龢请求暂缓实行容闳的计划,同时急忙携重金赶到北京,上下打点。在他的“努力”下,李鸿章、奕訢、奕劻、李莲英等全都表态支持。1896年11月中旬朝廷下谕要盛宣怀筹办银行,第二年5月末,盛宣怀创办的通商银行在上海开行,容闳的努力终告失败。

1896年和1898年,容闳还分别给清政府上了两个兴修全国铁路的条陈。他的计划宏大而周密,对如何组建铁路股份公司、如何管理铁路及沿线通讯设施、怎样开采铁路附近的煤矿铁矿、怎样招聘培养铁路技术管理人才等,都提出了细致入微的方案。虽然光绪皇帝在1898年2月批准了容闳的第二个条陈,即修筑津镇铁路,但铁路涉及各方利益,于是各利益集团开始争夺、破坏,盛宣怀、王文韶、张之洞、刘坤一等高官串通一气,共同反对;而且由于此路经过山东境内,德国认为“侵犯”其利益也表反对。如此强大的反对阵营,使

容闳的筑路计划胎死腹中。

容闳得知自己的银行、修路计划最后被朝廷否决时非常惊讶,他确实想不到清政府已腐败到如此程度,一切要金钱开道。慈禧宠臣、最有实权、坚决反对“新式”事业的荣禄更是最为贪渎之人,凡事以向他行贿多少决定行否。但容闳对这种“潜规则”却一窍不通,认为只要自己的计划对国家、对朝廷有利,就会得到朝廷首肯,根本没想到或不屑于行贿,结果大权在握、炙手可热的荣禄也对其表示反对。

无情的事实使容闳对清政府的贪腐认识更加深刻也更加愤怒,他一针见血地写道“究国家银行计划失败之原因,亦不外乎中国行政机关之腐败而已,尊自太后,贱及吏胥,自上至下,无一不以贿赂造成。贿赂之为物,予直欲目之为螺钉,一经钻入,即无坚不破也。简言之,吾人之在中国,只需有神通广大之金钱,即无事不可达其目的。事事物物,无非拍卖品,孰以重价购者孰得之。”^[8]

洋务派愿意创建现代银行、修造铁路,无疑较反对兴办这些近代新事业的顽固派大为开明进步。不过,由于这些新事业、新项目利益巨大,涉及各利益集团,因此各利益集团往往不择手段争项目、争投资,想方设法阻挠、破坏他人立项。对这种利益的争夺与分配,应有一套规范、透明的制度与程序制约,使之尽可能公平、公正。否则,必将导致贿赂公行,政府与社会将被迅速腐化。纵观晚清历史,清政府一直未能进行制度改革,建立最基本的有关制度与程序,政府的巨额投资完全由官场的权力、权谋和金钱主导,这是清王朝最后覆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时,已有人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意识到危机已迫在眉睫,开始酝酿进行制度变革。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登上了历史舞台。维新派的“机关报”《时务报》详细介绍了容闳创办国家银行和修筑铁路的内容,并加按语明确支持。湖南维新派创办的《湘报》也全文登载了容闳创办铁路的条陈及最后受阻的详情,为容闳打抱不平。

容闳早就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体制、制度问题,只是没有一个政治力量可以依靠,因此他从寻找、依靠洋务派创办新式教育入手,对朝廷还抱有一线希望。现在,通过洋务派的努力最后失败,但一股要求变革政治制度的政治力量突然崛起,并对容闳表示支持、声援,他自然与之一拍即合。容闳参加了康有为在北京发起的保国会成立大

会,对康的主张大表赞同,以后只要维新派开会他都积极参加,一起商讨变法大计。湖南在巡抚陈宝箴的经营下,实行“三湘新政”,成为维新运动最有生气的省份。湖南维新派积极与容闳联系,容闳也对“三湘新政”大表支持,举荐不少新式人才赴湘,双方遥相呼应,相互支持。此时康、梁刚登上政治舞台,容闳长康30岁,长梁45岁,已有相当社会声望,而且与康、梁是同乡,因此康、梁对他十分尊重,经常征求他的意见。而他在东华门附近的金顶庙(又称关帝庙)寓所,长期成为维新派聚会商议变法大计的场所,几乎成为维新派的会议室。维新派人士尊称容为“纯老”、“纯公”、“纯斋”,他们的许多重要建议、奏折和应对策略,都是在此讨论产生。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统筹全局”的奏折中,估算概行新政大致需要“五六万万”之款,因此建议派容闳赴美筹款,并多次对其人品备加称赞,推荐他担任外事联络(如向外国借款、办理外交等)职务。当时,维新派与顽固派的斗争一直非常激烈,容闳参与维新派活动引起了顽固派的注意。1898年5月中旬,坚决反对维新的体仁阁大学士徐桐上折弹劾维新派官员张荫桓说“又闻张荫桓与其同乡人道员梁诚、容闳等,与洋人时相往还,行踪诡密。”^[1]“与洋人时相往还”,虽未详说,却又明确含有与洋人勾结、卖国之意。近代以来,这是中国政坛攻击政敌最厉害、最有效的武器。

6月中旬,光绪皇帝正式颁发“明定国是”诏书,维新变法正式开始。制度变革必然严重触犯既得利益集团,因此,新、旧两派的斗争越来越激烈,9月中旬,双方已经水火不容,最后刀枪相见。光绪皇帝和维新派并无实权,实权掌握在坚决反对维新的慈禧手中,尤其是军权,完全被她掌控。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维新派只能铤而走险,孤注一掷,由谭嗣同在9月18日深夜只身前往手握一支新军的袁世凯寓所,劝说袁支持维新、武装保护光绪皇帝。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维新派约定在容闳寓所会面,等候谭的消息。谭嗣同带来的消息并不乐观,他们对未来忧心忡忡。随后两天,又传来光绪皇帝召见袁世凯但袁不表支持的消息。在一筹莫展之际,天真的容闳主动提出自己可以出面一试,请美国驻华公使对朝廷进行外交干预,看能否挽救维新败局。但康有为等认为,美国在中国没有驻军,没有军事压力,仅凭外交手段根本不能使慈禧就范,谢绝了容的好意。9月21日,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发动政变,维新失败。

在清廷四处捕人、风声危急之时,容闳首先想到的是康、梁等人的安危,设法帮他们出逃。他曾请求美国公使营救康有为,并写信给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请他设法营救梁启超。

容闳是维新派的核心人物之一,自然也被清廷“撤差”和通缉。这时京城已是缇骑四出,官府疯狂抓捕维新党人,一片恐怖。容闳冒险潜逃出京,跑到上海,在租界躲避清政府追捕。

五、走向革命

由于风声日紧,容闳在上海租界并不安全,便又从上海潜往香港。

虽然慈禧太后发动了戊戌政变,将光绪皇帝囚禁起来,但光绪皇帝比她年轻得多,今后很可能仍会重新掌权。所以,光绪皇帝的存在始终是慈禧的心头之患,便想将光绪废掉,另立新帝。消息传出,国人哗然。

1900年1月下旬,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联合在沪各省绅商等一千多人,发出反对废光绪另立新帝的通电,慈禧震怒,清政府立即通缉经元善。经元善只得逃到澳门,但澳门葡萄牙当局在清政府的授意下,将其拘押。容闳闻讯后,立即写信给香港总督,请其设法营救经元善。在香港总督卜力的斡旋下,澳门当局释放了经元善,容闳还将经接到香港。对容闳在危难时刻大力相助,经元善感激不尽。

自维新运动失败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开始活跃起来。在这种大背景下,容闳开始与革命党人接触。在第一批出国幼童中,有一位容闳的族弟容星桥,他回国后参加过1884年的中法海战,曾立功受奖,后退伍到香港经商。在香港期间,他与孙中山相识,并参加了兴中会。1900年3、4月间,经容星桥的介绍,容闳与革命党人多次接触,并向革命党人打听孙中山的情况,开始同情革命党。

此时,一场巨大的风暴正在形成,义和团在华北地区发展迅猛。慈禧最终决定明确支持义和团,企图利用义和团根绝维新隐患。因为慈禧等守旧派决定废除光绪,另立新君,但这一计划遭到西方列强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实现。对守旧派来说,光绪的存在确是潜在的巨大威胁。但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力量,便想依靠义和团的“民心”、“民气”,同时又相信义和团的各种“法术”真能刀枪不入,打败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洋人,于是决定用义和团来杀灭“洋人”,达到废立的目的,而义和团

本身的落后性也为这种利用提供了基础。1900年6月19日,清廷决定“向各国宣战”。

面对给中国社会、中华民族也给清王朝和一些官僚带来巨大灾难的混乱,已经返回上海的容闳心急如焚。他致电张之洞,希望张之洞在江南另立新政府,捧出光绪皇帝,在中国维新图强。这时,东南地区的官员们,如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开始“东南互保”,即东南地区保证外国人生命财产安全,外国不侵入这些地方。容闳认为,这一主张虽与他的方案非常不同,但却是受他提议的启发而来。

这期间,容闳一方面支持张之洞的“东南互保”计划,一方面积极参加维新派人士唐才常策划“自立军”起义之事。“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太后、皇帝逃离京城,举国纷乱无主。维新派认为大变革的时机已到,1900年7月,唐才常在上海张园召开国会会议,邀请维新派人士和少数革命党人与会。到会的有全国士绅、文化界和工商界人士,还有社会名流。大会一致推举容闳为临时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才常自认总干事。7月26日会议在上海愚园之南新厅召开,大会正式定名为“中国国会”,在不记名选举中容闳得票最多,当选为正会长。严复得票第二,当选为副会长。容闳用英文起草了《中国国会宣言》,由严复译成中文。几次会议,定下了几条宗旨:第一,“保全中国自主之权”;第二,不认通匪矫诏之伪政府,即指慈禧太后掌控的清廷;第三,“请光绪皇帝复辟”;第四,联络外交;第五,推广中国未来之文明进化,使中国“立二十世纪最文明之政治模范,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与之人民,借以驱除排外篡夺之妄”^[1]。

如上所述,容闳对张之洞表示支持,寄希望于张之洞支持“自立军”起义、接受“自立军”的拥戴,宣布两湖起义。但是,张之洞却静观事变,既不表示反对,也不表示支持。最后,张之洞认为慈禧仍掌大权,为向慈禧表示自己的忠心,于是疯狂捕杀自立军,追捕国会领袖。8月9日,唐才常一行离开上海前往武汉,准备在武汉发动自立军起义,其中,就有容闳的族弟容星桥。临行前唐才常曾会见容闳,商谈“自立军”起义事。8月21日,张之洞逮捕了自立军机关三十余人,次日即将唐才常等二十余人杀害,容星桥装扮成轮船苦力,才逃回上海。自立军起义宣告失败,容闳也被清政府通缉。此时,容闳实际已从改革走向了革命的边缘。

张之洞前后态度的变化,反映出一个久经官场的官僚的精明狡诈与冷酷无情。他当然知道支持“自立军”起义的巨大风险,但当时慈禧太后率当朝文武仓惶出逃,此时的中国确实处于“无政府”状态,无人能预料到中国下一步会有什么变化,因此,对拥戴光绪、主张维新的“自立军”,老谋深算的张之洞自然不会轻表反对。然而,一旦确定慈禧仍掌大权,“大清”王朝仍不会倒塌时,张之洞对“自立军”便毫不手软,血腥镇压,以此表示自己对慈禧、对大清王朝的忠诚,张曾经称赞容闳“才识博通、忠悃诚笃”,因此有“立场不坚定”之嫌。为“洗清”自己曾与维新派有过不浅来往,张之洞在《宣布康党逆迹并查拿自立匪首片》中,开列的“匪首”名单中,容闳的大名赫然在列。张之洞对“自立军”和容闳的态度的变化,典型地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官场文化”。

在义和团运动时期,不仅容闳“运动”张之洞在长江流域独立,孙中山也认为革命的时机已到,他作了几手准备,其中之一是对李鸿章寄予希望,通过关系想策动李鸿章在“两广独立”,成立新政府,并由容闳主管外交;同时加紧联络会党,准备在惠州发动武装起义,与长江流域自立军起义遥相呼应,武装割据华南一部分地区成立共和国。为联络以容闳为会长的中国国会,他于8月29日来到上海,造访英国驻沪领事,这时他才得知自立军起义已经失败,清政府正在大肆搜捕国会成员和自立军成员。同时,清政府已经得知孙中山到达上海的消息,要上海道台想法捉拿他。英国驻沪领事劝告孙中山马上逃走,以防不测。9月1日,孙中山化名“中山樵”,容闳装扮成一名商人,化名“泰西”,容星桥化名“平田晋”,乘日本轮船“神户丸”一同由上海赴日。在船上,容与孙首次相遇,畅谈国家大事,容钦佩孙中山的人品、胆识和才能,开始明确支持革命。

回顾容闳“走向革命”的过程,令人感想殊多。洋务运动时,他积极投身其间,想从器物、经济层面上改造中国,使中国富强。当变革制度的维新运动走上历史舞台时,他积极参加体制内改革的维新运动。这时,他并未从内心赞同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而当洋务、维新都告失败,维新派被慈禧为首的顽固派血腥镇压,后来又被他心目中的开明官员张之洞血腥镇压时,他便更进一步认识到很难在体制内改革清政府了。这一切,都使他最终走向暴力革命。

六、“红龙计划”

1901年初,清政府在香港暗杀革命党人杨衢云,并设法缉拿容闳。容闳愤怒谴责清政府的残暴行为。9月,一些革命党人在香港开始策划夺取广州的起义,决定事成后推举容闳为政府大总统,但容闳认为应当推举孙中山为大总统。此后,革命派与容闳密切联系。1902年夏,在香港策划夺取广州之起义的革命党人谢纘泰写信给容闳,请他“在美国组织秘密社团,并为争取美国朋友和同情者的合作和支持而努力”。容闳复信表示“我将尽我的努力满足你们的需要。请尽早将暗号和密码寄来。对于我们的通讯,这是不可缺少的东西。”^[1]

虽然革命派的几次起义全都失败,但容闳在美仍积极活动,联络了美国军事专家荷马李和财政界重要人物布思(Charles Beach Bothe),计划筹款,训练武装力量,支援中国革命。

这时,革命派和立宪派在海外展开了关于中国前途究竟是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还是以清王朝的改革实现社会进步的激烈争论。双方的辩论,从1901年拉开序幕,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达到高潮。众所周知,留日学生是革命党的重要力量。但留日学生起初对政治的兴趣有限,更不倾向革命。所以孙中山等人在“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时,其工作的主要对象是在日华侨而不是留日学生。但维新失败,梁启超亡命日本,议论国是,对留日学生触动很大,他们才开始关心政治。

1904年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不仅使中国陷入低潮的立宪运动风生水起,而且使一些留学生从“爱国”走向“革命”。

日俄战争是日本和俄罗斯两个帝国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侵略、争夺我国东北而进行的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对这场主要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直接关系中国利害甚至命运的战争,国人当然极为关注。人们纷纷预测战争进程、结局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特别是此时仍十分弱小的立宪派敏锐地感觉到这场战争有可能使国人的思想发生有利于政治改革的变化,自然关注异常。

戊戌维新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继续进行立宪运动。但其活动和影响主要是在海外,对国内的影响十分有限。此时他们作出判断,认为实行君主立宪的日本可以战胜仍行君主专制的沙俄。就在日俄宣战后的第三天,立宪派的《中外日报》即发表社论,认为长期以来都是白种

人打败黄种人,白种人对非白种人进行殖民统治,而这次战争将使人认识到国家强弱之分,不是由于人种而是由于制度。明确提出国家强弱的关键在于制度,而不在其他。还有文章预料日将胜俄,而此战之后中国人民的理想肯定与今天非常不同。

与立宪派预料并希望日本获胜相反,清廷和守旧派则预料俄国获胜。他们认为,日本为一小小岛国,远非地大物博的俄国的对手。他们还认为日本实行君主立宪是“以权与民”,这样士兵在战场必然会“各顾其命”,难打胜仗;而俄国是君掌大权,军队一定令行禁止,因此必然是俄胜日败。战争的发展证明立宪派预料的正确。1905年5月,历时一年多的日俄战争,终于以日本大获全胜告终。

由于国家一直处于亡国之危,而且中国完全没有立宪传统,所以多数国人并不关心限制皇帝权力的“立宪”、保护公民的“权利”等等,而萦绕心头的是国之兴亡。此次日本在打败君主专制的中国后竟又打败公认强大的也是君主专制的俄国,似乎以具体直观的事例告诉国人立宪可以强国、救亡。所以此前十年的甲午战争使一些先进者感到中国的富强在于维新,但有此认识者毕竟少而又少,而此时的日俄战争再次给国人以强烈刺激,促人猛醒,社会舆论和观念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立宪可以富国强兵、可以救亡图存,甚至某些原先反对立宪的守旧人物也转而倾向支持立宪。这样,原本影响不大、只是少数人认同的立宪活动因此影响大增,开始“复苏”,不久就迅速高涨,对全国性立宪运动的形成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如果说“立宪”的复苏是日俄战争的一个重要后果,那么一些青年由“爱国”走向“革命”,则是另一个重要后果。

早在1901年初俄国外交大臣提出全面剥夺中国在东北主权的约款时,爱国民众在当年3月就两次在上海张园集会,谴责俄国侵略行为,要求清政府拒绝签字,得到全国及海外华人广泛响应,他们还致电督抚呼吁拒俄。这次集会以士绅为主,对政府颇有期待,有人称为“尊君爱国有同心也”。正是在这种压力下,清政府未敢与俄签约。

1903年4月,俄国拒绝按约撤军的消息传来,4月27日,在上海的18省各界爱国人士第三次在张园集会,声讨俄国侵略中国的野蛮罪行,并一致议决发出两个通电:一个致各国外交部;一个

致清政府外务部,抗议俄国侵略,并成立了领导运动的中国四民总会。4月29日,在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集会,与会者群情激愤,决议成立拒俄义勇队,黄兴等130多人签名入队,陈天华等50余人签名加入本部。4月30日,在蔡元培的主持下,四民总会、爱国学社等1200余人在张园举行第四次拒俄大会。5月中旬,拒俄义勇队改为“军国民教育会”。在很短时间内,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拒俄爱国运动在大半个中国轰轰烈烈展开,尤其是留日学生,更加激烈。

面对独立的学生爱国运动,清政府认为是“反清革命”。驻日公使蔡钧在其奏折和给两江总督端方的电报中都将“拒俄义勇军”与从前的唐才常武装勤王的自立军相比,“名为拒俄,实则革命”。对此时尚属“立宪”阵营中的“拒俄”学生,清政府一开始是严令禁止,禁而不止之后,干脆坚决镇压。正是清政府对学生拒俄运动的严厉镇压,促使学生迅速激进化,开始转向革命。此时孙中山也将活动重点放在留学生身上,“革命力量”开始形成,“革命”与“改良”道分两途,“革命”虽仍弱小,但已有资格与“改良”展开理论论战。

日俄战争使立宪风潮初起,革命派开始形成。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清政府、立宪派、革命派这三种政治力量究竟如何分化演变、究竟谁消谁长,最后是立宪避免革命、抑或革命压倒立宪,还是既不立宪又无革命地维持现状,得看哪方能洞察时势、乘时运势了。

这时,留日学生就成了革命党与立宪派争夺支持的对象。由于康、梁的地位名声与学识水平,学生中倾向康、梁者自然居多。为争夺青年学生,本不居优势的革命派于是主动挑起论战。1905年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革命派即以此为阵地向立宪派猛烈进攻,而立宪派则主要以《新民丛报》为阵地奋起反击,双方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声势浩大的激烈论战,持续了15个月之久。论战涉及清王朝的性质、种族与民族问题、国民素质、中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体、土地制度、革命会不会招致列强干涉引起中国崩溃等许多方面。但是,最紧迫、最核心、最重要、甚至决定论战双方胜负的却是要不要暴力革命的问题。

简单地说,革命派认为,只有用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才能共和立宪。立宪派则认为,暴力只会导致血流漂杵,带来巨大的灾难,得不偿失。他们相信,只要人民要求立宪,清政府终会让步,可以

实现代价最小的和平转型。

从当时的民意基础上说,立宪派无疑更有“道理”。然而,它的理论前提是清政府在压力下必能“让步”,实行立宪。如果这个前提不存在,则无论说得多么“有理”,终将无济于事,“有理”会被人认为“无理”。

1906年9月1日,清廷颁发了仿行立宪的上谕,确立预备立宪为基本国策。而且,仅仅过了5天,即9月6日就颁布了改革官制上谕。显然,无论真假,慈禧这次也想走行政改革为先、政治体制改革在后的“先易后难”的“路线图”。

对此迟来的顺应民意之举,国内依然万众欢腾,一些大城市甚至张灯结彩,敲锣打鼓。学生、市民、绅商集会、游行、演讲表示庆贺,人们自发撰写的《欢迎立宪歌》表达了对朝廷的热爱尊崇和对暴力革命的对立。但事实说明,清廷并不珍视此时对它来说极其难得的民情民意,事实是各路权贵、官员借改官制你争我夺,种种矛盾更加尖锐、激烈,导致政坛严重分裂,不仅没有实质性改革,反而是满族亲贵的权力得到加强、汉族官员的权力被削弱。而且,还使人对清廷是否真准备立宪大起疑心,甚至有立宪派直斥其为“伪改革”、“徒为表面之变更”、“袭皮相而竟遗精神”。参与保皇会之宪政会组建的徐佛苏当即评论道“政界之事反动复反动,竭数月之改革,迄今仍是本来面目。军机之名亦尚不改动,礼部仍存留并立,可叹。政界之难望,今可决断……诚伤心事也。”^[3]

清廷以自己的所作所为无情地说明,这次官制改革的效果与清廷初衷正相反,彻底失败。不仅没有缓解危机,反而加剧了危机。这一点,梁启超其实十分清楚,所以他在1906年给康有为的信中承认“革命党现在东京占极大之势力,万余学生从之过半;前此预备立宪诏下,其机稍息,及改官制有名无实,其势益张,近且举国若狂矣。东京各省人皆有,彼播种于此间,而蔓延于内地……”^[4]清廷刚宣布预备立宪时,革命派的力量就“稍息”;而当人们认识到清廷的立宪有名无实时,革命派就“其势益张”。显然,革命派力量的“息”与“张”,与清廷所作所为大有干系。所以,论战不到半年,梁启超就通过种种关系,私下托人与“革命党”讲和,表示希望停止论战。1907年初,他在《新民丛报》发表了《现政府与革命党》一文,更是承认“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5]真的是一语中的。这场论战,以往说革命

派“大获全胜”，肯定夸张。双方各有道理，实难分胜负。但经此论战，革命派的影响、声势空前壮大却是事实。其主要原因，还在拒不进行实质性改革的清政府是“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梁氏一直反对激进革命、反复论述暴力将带来灾难性后果、极力主张温和改革，却能正视不利于自己观点、主张的事实，确实难得。

人们当然可以分析种种原因，如没有开明且强有力的中央权威，利益集团毫无远见、不愿自己的利益受到丝毫损失……反正最终结果就是这样，使坚决反对革命、坚持“保皇”的“立宪”派对它越来越失望，无奈地叹其“反动复反动”，这也就不必更多地指责“革命”了。无论是否喜欢、是否赞成“革命”，都应像坚决“反革命”的梁启超那样，承认革命正是因清政府的所作所为而“其势益张，近且举国若狂”的。正是如此这般“改官制”，使在与“改革”竞赛中原本落后的“革命”意外得到清政府的推助加力，猛然提速，急起直追。

事实一再证明梁氏所言不虚。清廷 1908 年秋公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君权”比“明治宪法”扩大、“民权”比其缩小。在这种宪法框架下，再加清政府的“立宪”实际步骤一拖再拖，连以温和的士绅为主的立宪派都指其为“假立宪”、“伪立宪”，谴责“政府宁肯与人民一尺之空文，不肯与人民一寸之实事”，开始号召“人民与之争者，宜与争实事，而不与争空文”，“逢清必反”的革命派的反应就更不必说了。

从 1910 年 1 月起到 11 月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以地方士绅为主的“立宪派”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声势浩大，遍及全国。尽管“开国会”的呼声越来越响，一浪高过一浪，清廷就是毫不妥协，不愿让出点滴权力，拒不开国会，拒不立宪，反而采取越来越激烈的手段镇压立宪运动。清政府确已不堪救药，对各种警劝充耳不闻，一意孤行，仍要大权独揽，结果便是众叛亲离，真正“动摇国本”，离垮台其实只一步之遥了。

现在，有些论者极力想搞清清政府究竟是“真立宪”还是“假立宪”。这种探索自有其意义，但对于研究清王朝为何灭亡、激进的革命党为何成功而言，更重要、更有意义的不是清政府此时的立宪“实际”究竟是“真情实意”还是“虚情假意”，而是它的行为给被统治者何种印象、何种感觉及他们最后的主观认识是“真”还是“假”。如果清政府是真立宪，则激进的革命党的活动空间将十分有限，更难成功；如果清政府是假立宪，温

和变革的前提就全然而失，激进的革命党就能轻易得逞。

事实说明，清政府的立宪无论是“理论原则”还是“具体实践”，都远未达到温和的立宪派的要求，更未能让社会各界相信其“真立宪”。当一个政权的统治基础都对其动机大表怀疑、毫不信任，对其所作所为大表反对时，这个政权就面临着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了。严重的“合法性危机”恰为激进的革命准备了条件。此时，清政府就面临着这样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一场暴力革命，恐怕已难避免。

1910 年 6 月，第二次国会请愿被拒后，立宪派态度明显激烈，公开号召民众要“消灭政府假立宪之威焰”，“破除假立宪之狡猾”。他们和清廷权贵的关系，也开始明显紧张起来。10 月 - 11 月第三次国会请愿被拒，清廷严令请愿代表“即日散归”，不许在京城逗留。随后，东三省请愿代表被逐，天津学界请愿同志会会长温世霖被遣戍新疆。这样，立宪派和清廷之间的关系已到破裂边缘。但是立宪派对“请愿”仍未最后绝望，被谕令“即日散归”的请愿代表们临走前仍表示不会放弃继续请愿的打算。

就在辛亥革命前夜的 1911 年 5 月 8 日，清廷利令智昏地出台了一个垄断权力的“皇族内阁”。这个内阁由 13 人组成，其中 9 名为满人，汉人只有 4 名；而在这 9 名满人中竟有 7 名为皇族成员，因此人们将此称为“皇族内阁”。这种“组阁”完全违背了皇族成员不能入阁当国务大臣的基本原则，实际向世人显露了清廷所谓“立宪”只是一个幌子、其实根本不愿放弃一丁点权力的真实面目。此举实无异于自掘坟墓，结果使作为其统治基础的士绅阶层与其迅速疏远，并最终弃它而去。

尽管如此，立宪派最上层领导不放弃最后希望，仍想走相互妥协的改革之路。5 月 12 日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在北京召开，商讨对策。第二天，确定了以推翻皇族内阁为中心议题，大家一致认为皇族充当阁员违背立宪原则，一致反对。但经过冷静的思考，与会者后认识到实际无法达到目的，于是决定妥协让步，认可皇族成员违反规定任内阁阁员，但反对皇族充当内阁总理大臣，希望朝廷也妥协一步。6 月 6 日，他们将此议案呈请都察院代奏，请另简大员组织内阁，但朝廷置之不理。咨议局联合会于是再次呈请都察院代奏，同时公开发布报告书，指出皇族内阁“名为内阁，实则军机；名为立宪，实则专制”。

然而,皇族内阁非但不思悔悟,反而在7月5日副署的上谕中斥责联合会议论渐进嚣张,干预“君上大权”。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观念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天下为一姓所有,臣民实际都是皇帝的奴仆,根本无权过问、干预“君上大权”。

现在有观点认为辛亥革命过激,缺乏妥协,然而史实说明,拒不妥协的恰恰是清王朝。连立宪派提出的皇族成员可违反原则当内阁阁员、但不可当总理大臣这种双方各让一步、最低限度的妥协方案,清廷都严辞拒绝,其他妥协就不必谈了。

在这种士绅态度都渐趋激烈的背景下,容闳革命的信念更加坚定了,他一直与美国军事专家荷马·李和金融界巨头布思密切联系。1909年2、3月间,容闳向荷马李、布思提出了一个“中国红龙计划”(Red Dragon—China)。该计划提出支持革命党进行武装斗争,筹款500万美元、购买10万支枪和1亿发子弹。此后,容闳一直努力筹划此事。旅居新加坡的孙中山,与容闳通信频繁。在容闳的介绍下,孙中山与荷马李和布思联络密切,商量借款资助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的问题。12月22日,孙中山接受容闳的邀请,到纽约与他见面。在容闳的安排下,孙中山分别与荷马李和布思多次密谈,制定起义计划,决定通过布思向纽约财团洽谈借款350万美元,由荷马李训练军官,以助中国革命党推翻清王朝。待革命成功后,美国权券人享有在华办实业、开矿等特权。此后,容闳经常写信给荷马李和布思,催促此事的落实。

1910年2月,容闳致信孙中山,进一步提出“中国红龙计划”的实施步骤,并提出四条建议:第一,向美国银行借款150万至200万美元,作为起义费用;第二,任用精明能干、通晓军事的人统帅军队;第三,组织、训练海军;第四,成立临时政府,推举贤才,接管起义后所夺取的城市。3月初,容闳写信给孙中山,建议他与布思、荷马李再次认真商谈、逐条落实借款事项。不久,容闳又写信给布思,提出一个借款计划,即借款1000万美元,分5次支付,期限为10年,年利息为15%。经多次协商、反复研究,孙中山和荷马李、布思达成了五条协议:第一,向美国财团借款350万美元,分4次付给,作为军事经费;第二,在借款手续上,由孙中山草签一个由各省革命党代表联名签字的借款文件,作为正式借款的凭证,并以革命党领袖孙中山的名义,委任布思作为中国革命党在外国借款的全权代表,负责具体办理借款事宜;第三,认真商量筹组临时政府,招纳各种有权威的贤

能人才进入内阁;第四,请美国军事家帮助,训练一批军官,增强起义指挥能力;第五,为了集中人力、财力组织发动具有全局影响力的大型起义,暂时停止华南和长江流域的小型而准备不充分的武装起义。

孙中山将此协议和下一步行动计划迅速信告在国内的黄兴。由于种种原因,此计划未能实现,但此计划却对孙中山以后的武装起义方针有积极影响,使他开始放弃和停止了不成熟的零散的武装起义,支持黄兴集中财力人力,发动影响巨大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和武昌起义。

对“红龙计划”的实施,容闳一直十分关注,直到1911年春仍写信给荷马李和布思,催促他们落实与孙中山谈判商定的计划。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成功。起义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以士绅为主体的立宪派此时决定支持革命。

革命爆发的消息传来,久卧病床的容闳兴奋异常。12月19日到29日,容闳连续写三封信给谢纘泰,热烈欢呼推翻帝制的伟大胜利。同时详述了自己对革命发展的观点。虽然去国已久,但从信中可以看出他对国内情况并不隔膜,尤其是对袁世凯可能窃取革命成果的提醒,极有预见性。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第二天便亲笔写信给容闳,诚邀他归国担任要职,并寄去一张自身近照。由此可见容闳在孙中山心中的地位。但遗憾的是,命运并未给容闳再次回国、一展宏图的机会。4月上旬,年老者体迈、久病在身的容闳病情更加严重。4月21日上午,容闳病情继续恶化,抢救无效,逝世于美国康州哈特福德城沙京街寓所。

容闳这位理性的温和的革新人士一步一步从洋务、维新走向革命的过程,正是清王朝拒不主动变革甚至镇压体制内改革者,把许多原本是体制内的改革者,诸如立宪派推到体制外,一步一步自取灭亡的过程。

容闳的经历表明,正是清政府的冥顽不化,政治上拒绝改革、摇摆不定甚至倒行逆施,使从来温和谨慎的士绅商董都开始远离它、抛弃它进而反对它!昔日所谓“缙绅之家”比今日所谓“中产阶级”还要“多产”,因此更加接近、贴近、亲近统治者,更加期盼和平稳定,更加温良恭俭,他们尚且态度大变,又怎能指责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推翻清王朝是“激进”呢?武昌起义时孙中山远在美国科罗拉多,事先并无预闻,第二天才从美国报纸上

得知此事,亦从一侧面说明清王朝的轰然坍塌实因其统治基础已经根本动摇。换句话说,是清政府的极端顽固,最后“造就”了辛亥革命的“激进”。纵观晚清历史,每当还有一线希望,还能控制一定局面的时候,清廷总是拒不变革;只到时机已逝、完全丧失操控能力的时候,它才匆匆忙忙地被动“变革”。改革愈迟,所付出的“代价”也将愈大。但清廷对此似乎毫无认识,它总是在下一个阶段才做原本是上一个阶段应做的事情,而且不愿再多做一点让步和妥协,步步被动,一拖再拖,一误再误,完全丧失了变革的主动权,始终是被“形势”推着走。这样,它后来便不得不为此付出更高的代价。

“改革”是当事各方都以理性的态度妥协的结果,只要有一方坚持不妥协,就无法“改革”,社会矛盾必然要以不是“坚决镇压”就是“激烈革命”一类的暴力方式来解决。一场巨大的社会革命,其实并非革命者的主观“激进”造成的。在社

会矛盾中,统治者往往居于“主导”地位,革命往往是由统治者的种种“极端”触发、造成的。几乎每个时代、每个社会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激进”思想,但在承平年代开明社会,形形色色的激进思想于民众之影响者几希,更掀不起能动荡社会的大风大浪,只能是屈居一隅的少数人之信念,不足为意。然而,一旦社会腐朽不堪,而统治者又拒绝改革以疏不满以缓危机,民众忍无可忍最后抱定与之偕亡之心,则蛰伏已久的激进思想便如狂飙突起,成为席卷一切的巨浪大潮。此时此刻,惟最激进者最有吸引力,暴力肯定不断升级,愈演愈烈,最终火焱昆岗,玉石俱焚,然事已至此,奈何者谁?

纵观近代中国历史,“激进”、“革命”其实是清政府的“不改革”逼迫出来的。所以,与其指责民众变革的“激进”,不如批评统治者的“顽固”;与其呼吁民众不要“激烈革命”,不如吁请统治者不要“拒不改革”。

参 考 文 献

- [1] 容闳《容闳自传》,恽铁樵、徐凤石译,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31、32、65、75-82、98、123、120、156页。
- [2] 《光绪七年五月十二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訢等奏》,《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65-166页。
- [3] 《徐桐光绪廿四年闰三月二十七日参张荫桓贪奸误国折》,转引自袁鸿林《容闳述论》,《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3期。
- [4] 尚秉和《革命春秋》,《辛壬春秋》卷33,辛壬历史编辑社,民国十三年版。
- [5]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5页。
- [6] 徐佛苏《致任公先生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8页。
- [7] 梁启超《与夫子大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3页。
- [8] 梁启超《现政府与革命党》,《饮冰室文集》卷32,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3页。

Towards Revolution: A study of Yung Wing

LEI Yi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6, China)

Key Words: Yung Wing; students studying abroad; reform; revolution

Abstract: Yung Wing was the pioneer in the cause of students studying abroad in modern China. From participation in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reform movement to the final support for the 1911 revolution, his tortuous process from a moderate reformer to a violent revolutionarier, not only reflects the mentality of the students studying abroad, but also reflects social changes in modern China. Therefore his life, like a mirror, reflects the historical trend of modern China. His case illustrates that the occurrence of revolution is often due to the ruling class unwilling to reform.

责任编辑:周 棉